

杨耕:“光荣的路是狭窄的”

○ 王峰明

(《前线》杂志社, 北京 100013)

一、体验哲学

王峰明 (以下简称“王”):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哲学似乎是一门艰涩隐晦、枯燥乏味的学科, 高深莫测, 与现实无关。看到您的一些文章和媒体对您的访谈, 发现您对哲学有一种独特的理解, 对哲学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爱”.....

杨耕 (以下简称“杨”): 我之所以“爱”哲学, 是因为哲学本身“可爱”, 而哲学之所以“可爱”, 是因为哲学关注的是人, 哲学与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密切相关, 与解答人生之谜融为一体。无论哲学把目光投向人与自然的关系, 还是转向人与社会的关系, 归根到底, 关注的仍是人在世界的位置, 显示的仍

编者按: 杨耕, 1956 年生。安徽合肥人。1982 年毕业于安徽大学, 获哲学学士学位; 1991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先后获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求是》、《哲学研究》、《唯物论研究》(日本)、《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 200 余篇; 先后出版《杨耕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意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等专著 10 部。这些论著以其崭新的理论视角、宽广的理论空间、独到的理论见解, 展示出一种新的理论态势, 引起哲学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前线》杂志社王峰明博士就“学问人生”话题, 采访了杨耕先生, 现将访谈记录整理后发表于下。本刊欢迎更多学有建树、学有成就的社会科学家, 特别是中青年社会科学家介绍和回顾自己的学术贡献和人生感悟。

作者简介: 王峰明, 哲学博士。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社记者、编辑。

是人的自我印象。如果哲学不重视人，人也就不会重视哲学。当然，我注意到，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必然渗透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生的不同看法必然包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饮食男女本是一种自然现象，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及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爱情悲剧却是一种社会现象。“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千古绝句表明，人的死本身属于自然规律，死的意义却属于历史规律。英雄与小丑、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就在于是否把握和如何处理人与历史规律的关系。人生观的问题不是科学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是哲学问题。反过来说，哲学应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重关系中关注人，从人的活动及其规律中去把握人本身。这样，哲学就会既可爱又可信。

哲学之所以给人们一种艰涩隐晦、枯燥乏味、与现实无关的印象，这是由于哲学的论证方式造成的，即哲学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抽象的概念运动，这种抽象的概念运动很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云山雾罩”的感觉。但只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这种抽象概念运动背后的现实问题。换言之，哲学的论证方式是抽象的，哲学的问题却是现实的。哲学家无论如何“超凡入圣”都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他们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现实中提出特定的问题、特定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答案。即使表面上看来荒诞不经、信奉“语言游戏论”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用后现代主义大师杰姆逊的话来说，就是后现代主义“是在一个已经忘记如何进行历史性思考的时代里去历史地思考现实的一种努力”。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福柯为什么关注“知识、学术、理论同现实的关系”，而德里达为什么提出解构必须向既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的社会结构挑战。实际上，哲学是以抽象的概念运动反映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人的现实的运动。这就注定哲学思维极其艰辛。谁选择了哲学并想站在这一领域的制高点上，谁就必然在精神乃至物质上选择一条苦行僧的道路。借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就是“光荣的路是狭窄的”。

王：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认为当今中国的哲学越来越趋于“冷寂”以至衰落，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这种“冷寂”、衰落将呈加速态。

杨：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看到了某种合理的事实，但又把这种合理的事实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和改革开放之前，尤其是“文革”中“全民学哲学”的“盛况”相比，目前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确显得较为冷清，许多

人对哲学持一种冷漠、疏远的态度。但是，我不能不指出，改革开放前的哲学繁荣是一种虚假繁荣，是一种受功利主义支配和领导人好恶引导的假性繁荣，其中不乏对哲学肤浅甚至庸俗的理解以及急功近利的运用。而目前所谓的哲学“冷寂”实际上是人们对哲学本身的一交深刻反思，是一种对哲学本身的学术回归。具体地说，哲学界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反思，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批判反思，以及通过哲学的重新定位完成了这种学术回归。在我看来，正是这三个“批判反思”以及“重新定位”促使当今中国的哲学走向成熟。换言之，当今中国哲学的“冷寂”并不意味着哲学的衰落，相反，它预示着中国哲学的成熟。

实际上，市场经济与哲学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不能相融。没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近代的法国启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也就没有现代的存在主义哲学、结构主义哲学以及解构主义哲学，当然，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市场经济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是从人的依赖性向人的自由个性过渡的时代，而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又是同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交织在一起，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的，可谓史无前例，必然引起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哲学问题，必然为人们的哲学思考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目前市场经济对哲学的冲击是对以往哲学虚假繁荣的矫枉过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广度和深度的拓展，中国哲学必将加速走向真正的繁荣。

王：您谈到了哲学的重新定位，这涉及到哲学的功能，涉及到哲学家的使命问题。你如何理解哲学的功能和哲学家的使命？

杨：哲学的功能是什么，或者说，哲学应该干什么，这是一个最折磨哲学家耐心的问题。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不同哲学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人类思想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要研究新问题外，往往还需要不断回过头去重新探讨像自己的对象、性质和功能这样一些对学科发展具有方向性、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哲学也是如此。从根本上说，我们应当根据时代需要、人类的认识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结构来判断哲学的位置和功能。哲学并不等于科学，当代科学的发展已经使“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成为“多余”的了。换言之，在当代，企图在科学之上再建构一种所谓的关于整个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只能是“形而上学”在当代的“复辟”。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促使哲学趋向于生活世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哲学应关注人类世界，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发展。为此，哲学应探求和把握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为人们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提供一种批判的精神、

反思的方法，并通过自己的反思性、批判性以及理想性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我始终认为，哲学研究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是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哲学必须与现实“对话”，这是哲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否则，哲学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当今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现代化，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壮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思索与奋斗、光荣与梦想。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的根本任务；同时，这种经济市场化又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制度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当代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而且是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最突出的特征和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代，构成了一场极其复杂、艰难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的社会变迁。关注这一现实，从中探讨、把握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建构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支柱，这是当代中国哲学义不容辞的任务；从总体上把握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由此引发对民族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活动方式以及社会发展的哲学思考，反过来，以一种面向 21 世纪的哲学理念引导现实运动，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应有的良心和使命。哲学家不能“作茧自缚”，与现实隔绝，喃喃自语，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在我看来，这样的哲学话语只能是“多余的话”。

王：哲学联系现实是否就是仅仅理解、解释现实，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是单向还是双向的？

杨：哲学与现实是一种双重关系：一方面，哲学不能脱离现实，必须直面现实问题，解答时代课题，否则将失去自己存在的根基；另一方面，哲学又必须进入抽象的概念运动领域，以概念运动反映现实运动，否则就不是哲学。哲学必须以哲学的方式联系现实，解答时代课题。在联系现实的过程中，哲学不应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反思性和批判性，不能把自己降低为现实的附庸或仅仅成为现实的解释者。一种仅仅适应现实的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在我看来，现实创造哲学，哲学也影响现实；现实校正哲学发展的方向，哲学也引导现实的运动。哲学既要入世，又要出世；既要深入现实，又要超越现实。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我们不能只看到现实对哲学的单向关系，忽视了哲学对现实的影响、引导作用，忽视了哲学本身的创造力量。当代中国的改革就是现实

的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现实的超越，而引导这一超越的就是邓小平理论，包括邓小平的哲学思想。

王：您谈到了哲学的功能、哲学家的使命以及哲学与现实的关系，这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过去我们把哲学与政治等同起来，现在一些人强调哲学应该远离、脱离政治。您如何看待哲学与政治的关系？

杨：哲学不等于政治，哲学家不是政治家，有的哲学家想方设法远离甚至脱离政治，但政治需要哲学，哲学不可能脱离政治，哲学总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蕴含着政治。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哲学既离不开政治，也离不开政治的后果。”实际上，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哲学追求的是真理，又是某种信念。从根本上说，哲学是以抽象的范畴体系，并透过一定的认识内容而表出来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它总是体现着特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明快泼辣的法国启蒙哲学是如此，艰涩隐晦的德国古典哲学是这样，高深莫测的解构主义哲学也不例外。用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解构主义通过解构既定的话语结构挑战既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结构。哲学总是具有自己特定的政治背景，总是或多或少地蕴含着政治，具有这种或那种政治效应。当然，哲学命题的理论意义与政治效应并非等值，但哲学具有这种或那种政治效应却是无疑的，而且同一个哲学命题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往往产生不同的政治效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这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常识”命题。然而，它在 1978 年的中国政治生活中转变为一个极强的政治性命题，它所产生的政治效应是巨大的，以至于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哲学不能成为某种政治的传声筒或辩护词，因为哲学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哲学也不能远离甚至脱离政治，因为哲学与时代的统一性首先是通过它的政治效应来实现的。我认为，哲学家既要有自觉的哲学意识，同时又要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才能理解和把握时代的需要。

二、重读马克思

王：世纪之交、千年更替之际，从西方传来两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一是在英国 BBC 公司、路透社等媒体所作的民意测验中，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来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而且位居榜首；二是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出版了《马克思的幽灵》，这部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给予高度评价，并震动了西方思想界。国内一些学者把这两件事视为“马克思思想当代复兴”和“马克思哲学世纪凯

旋”的标志。作为一个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您是如何看待这两件事，尤其是《马克思的幽灵》一书的？

杨：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为这两个“事件”感到高兴，并为此所激动。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思想家，使我不禁想起了中国一句古老的谚语：“公道自在人心”。但我对把这两件事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复兴”和“世纪凯旋”的标志，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马克思的幽灵》的确给予马克思高度评价，但我们不能不看到，《马克思的幽灵》是从解构主义立场出发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旁证解构主义的。在这一“联姻”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已被德里达以解构性的阅读重新书写，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成为一种解构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如此，我仍十分敬佩德里达的理论勇气。苏东巨变之后，“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历史已经终结”之类的话语甚嚣尘上，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病”。而恰在之时，德里达郑重推出《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大声疾呼“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这的确体现出一种巨大的理论勇气。《马克思的幽灵》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德里达在此已经超越了“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把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院式的研究转换为联系实际的研究”。所以《马克思的幽灵》的确包含着真知灼见以及鞭辟入里的分析，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可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在《哲学研究》2000年第5期发表了《德里达：从解构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解构〈马克思的幽灵〉》，对《马克思的幽灵》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王：我注意到，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范式是独特的。《理论前沿》2000年第1期发表文章认为，您的解读范式“提供了一种新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解途径，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建构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对于我国哲学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具有突破性意义”。

杨：这个评价过高，我实在不敢当，但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划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它实现了哲学主题的根本转换，即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类世界，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人的自由和尊严、人类解放。当马克思把目光转向人类世界时，他就同时在寻找理解、解释和把握人类世界的依据。这个依据终于被发现，这就是人类实践活动。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在实践中，人是以物的方式去活动并与自然发生关系的，得到的却是自然或物以人的方式而存在。在这个过程中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换言之，人通过实践为自己创造了一个

自然与社会“二位一体”的人类世界。在人类世界中，实践具有导向作用，即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为天地立心”，在物质实践的基础上重建世界。实践构成了人类世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构成了人类世界的本体。这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不断生成的本体，人类世界因此成为一个不断形成更大规模、更多层次的开放性体系。我认为，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或物质第一性，这只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共性，确认实践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人类世界的基础，这才是新唯物主义的“唯物”之所在，或者说，是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

从哲学史上看，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发动一次震撼人类思想史的哲学革命，关键就在于，它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问题，从而使唯物主义和人的主体性结合起来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也结合起来了。实践的观点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当代“不可超越”，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抓住了人类世界的根本——实践，并从这一根本出发向人类世界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种层次、各种关系发散出去，提供了“整体社会的视界”，并契合着当代的重大问题，具有“令人震惊的空间感”。

王：您提到旧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通常认为，旧唯物主义包括自发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则是辩证唯物主义，而自发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构成了唯物主义的三种历史形态。据说您近来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杨：按照这种传统的观点，自发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三种唯物主义形态在观察世界的理论视角上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即三者都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只不过自发唯物主义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把世界理解为一个个静止、孤立的事物；辩证唯物主义则把世界理解为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物质体系，而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这种观点有其合理因素，但它的确忽视了唯物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主题转换或观察世界理论视角转换这一根本问题，而且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抛弃了。恩格斯说过，随着自然科学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实际上，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唯物主义不但要改变自己的理论形式，而且要转换自己的理论主题。从理论主题或观察世界理论视角

的历史转换这一根本点上看，唯物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三种历史形态，即自然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自然唯物主义始自古希腊哲学，后在霍布斯那里达到系统化的程度，并一直延伸到法国唯物主义中的机械唯物主义派。它或者在直接断言世界本身的意义上去寻求“万物的统一性”，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自然物质的某种形态，或者以经验科学对自然现象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在“认识论转向”过程中去探讨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并把物质世界以及人本身归结为自然物质的某一层级。从总体上看，自然唯物主义根据“时间在先”的原则，把整个世界还原为自然物质，人则成了自然物质的一种表现形态。自然唯物主义确认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却一笔抹杀了人的主体性和历史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唯物主义发展到霍布斯那里，“变得敌视人了”。

人本唯物主义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中的另一派，即“现实的人道主义”，并在费尔巴哈那里达到了典型的形态。费尔巴哈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作为其“唯一的、最高的对象”，并力图通过对思辨哲学以及神学的批判而“建立人的哲学批判”。按照费尔巴哈的观点，自然界是第一性的实体，但人在地位上是最重要的实体，“人是自然界最高级的生物”，因而是理解自然的钥匙。因此，要“弄清楚自然的起源的进程”，“必须从人的本质出发”。费尔巴哈力图以“现实的人”为基本原则来理解世界并构造哲学体系，从而建构了人本唯物主义。然而，费尔巴哈不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感性世界的本体，所以，费尔巴哈最终得到的仍是抽象的人，忽视的仍是人的主体性和历史性。在人本唯物主义体系中，自然和历史仍处在对立之中，“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因此，超越人本唯物主义，建立和“历史”相结合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论和历史的双重要求。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第三种历史形态。

王：可是，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一种历史观或历史哲学，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哲学形态。您也一直持这种观点，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历史哲学。那么，作为一种历史观或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怎么能构成一种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形态呢？

杨：我的观点近来有较大的变化。我现在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从形式上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仅仅是人类社会或人类历史，似乎与自然无关。但问题在于，社会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们为

了能够生存和生活,必须进行特质实践,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了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和人之间必须互换其活动,并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说,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和“实际日常生活”始终包含着并展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包含着并展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和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实际日常生活”所包含和展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中的“历史”是人的活动及其内在矛盾,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得以展开的境域。历史唯物主义正是把人的实践活动作为社会的现实基础,力图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来改变人与人的关系,通过人对物的占有关系(私有制)的扬弃来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这种否定性关系是最深刻、最复杂的矛盾关系。历史唯物主义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深入而全面的剖析,科学地解答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同时就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日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形成之时。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逻辑上说,历史唯物主义都不是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里的“推广和应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反,那种“排除历史过程”,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就其实质而言,它只能是自然唯物主义在现代条件下的“复辟”。在我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两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代名词。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否定性的辩证法”。因此,作为“全部社会生活”哲学反映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蕴含着“否定性的辩证法”,本身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代名词,是为了凸显历史唯物主义所内含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把实践唯物主义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一代名词,是为了凸显历史唯物主义所内含的实践维度及其首要性和基本性。以现实的人及其发展为思维坐标,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和建构原则,去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使历史唯物主义展一个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新的理论空间，即一个自足而又完整、唯物而又辩证的世界图景。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内含着“否定性辩证法”，所以马克思称之为“真正批判的世界观”。

王：1989年，您曾提出“拒斥形而上学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则”，并引起了较大的争议。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10多年了，您是放弃还是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杨：我仍然坚持这一观点，而且认识比以前更深刻了。我正在撰写的系列论文《“形而上学”的命运与现代唯物主义的使命》，力图更加深入而系统地阐述“拒斥形而上学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则”这一观点。

王：请您具体谈谈。

杨：从起源上看，“形而上学”形成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形而上学”就是“第一哲学”，即关于存在之存在的学说，或者说是研究超感觉的、经验以外的对象的学说。换言之，“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是一切实在对象背后的那种终极存在。这种哲学形态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力图从一种永恒不变的“终极存在”或“初始本原”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性和行为。从历史上看，“形而上学”在对存在的本质和世界的终极存在的探究中，确立了一种严格的逻辑规则，即从公理、定理出发，按照推理规则得出必然结论。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家们把“形而上学”中的存在日益引向脱离现实事物、超越人的存在，成为一种完全抽象化的本体，甚至使“形而上学”中的存在成为一种君临人与世界之上的一种神秘的主宰力量。“形而上学”从此失去了自身的积极意义。

到了18世纪，自然科学已经独立化，从“形而上学”中分化出去，“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地范围”，“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变得枯燥乏味了”。同时，随着反封建、反宗教斗争的发展，人本身再次觉醒，开始注意自己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实在的本质和尘世的事物开始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而“形而上学”所忽视的恰恰是人和人的存在。所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一开始就反对“形而上学”。在人类思想史上，法国唯物主义是以提出以人作为哲学的中心而开始其发展历程的，倡导发挥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是其理论主张。然而，事与愿违，刚从神权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人在此又变成了一架“机器”，人和

人的存在都被消解于抽象的本体之中。换言之，法国唯物主义举起了反“形而上学”的大旗，但它并未完成反“形而上学”的任务，或者说，它没有从根本上摧毁“形而上学”。所以，“形而上学”后来在 19 世纪又重新登上了哲学的王座。正如马克思所说，“形而上学”“在 19 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即黑格尔使“形而上学”与概念辩证法融为一体了，整个世界被描述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之中。然而，在黑格尔哲学中，人的本质不是存在于人的现实存在中，而是存在其体系的“人”的概念中；人成了绝对理性自我实现的工具，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主体性从根本上被剥夺了，人的自由和尊严在此都被消解于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中。这就是说，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中，不仅本体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人也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人的存在消失在绝对理性的阴影之中。海德格尔因此把柏拉图以来的整个“形而上学”时代称之为“存在的遗忘的时代”，并认为“形而上学”的各种命题总是把存在者和存在相互混淆，而且由于这种“永久的混淆”，“形而上学”使我们陷入完全错误的境地。

因此，到了 19 世纪中叶，西方哲学再次掀起反“形而上学”的浪潮。费尔巴哈“巧妙地拟定了批判形而上学的基本要点”。孔德和马克思则从根本上摧毁了“形而上学”。孔德从自然科学的可证实原则出发批判了“形而上学”，马克思则从人的存在的基础——实践活动出发批判了“形而上学”。尽管马克思“拒斥形而上学”与孔德“拒斥形而上学”的指向性上具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指向自然科学，前者指向人的存在，但二者在时代性上却是一致的，即这是现代精神对近代精神和古代精神的批判。这次批判及其胜利是永久性的胜利，“形而上学”从此不可能东山再起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海德格尔公正地指出：“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

在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之后，唯物主义的理論主题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即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类世界。换言之，现代唯物主义关注的是人的存在和发展，它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实际日常生活”所包含和展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现代唯物主义不是从“抽象的物质”出发，更不是以经院哲学的方式抽象地谈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是从实践出发，通过对现代社会的异化状态和普遍存在的“拜物教”的批判，揭示被物的自然属性掩盖着的人的社会属性，以及被物与物的

关系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同时意味着哲学的转轨，即从传统哲学转向现代哲学。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日趋“现实的生活世界”，关注人的存在。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就是“哲学所力求的目标在于领悟人的现实境况中的那个实在”。这使我不禁想起海德格尔的一段话：以往的哲学“总是把目标指向在者的最初的和最后的根据，仿佛哲学能够而且必须为当下以及将来的历史的此在，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基础。然而，对哲学能力的本质做这样的期望和要求未免过于奢求。”

王：据我所知，这些是您重读马克思所获得的认识。1995年，您明确提出“重读马克思”，并认为可以以此来概括您的全部理论研究。我现在想问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促使您重读马克思的？

杨：从思想史上看，“重读”是常见的现象。黑格尔重读柏拉图，皮尔士重读康德，歌德重读拉斐尔……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思想史就是后人不断“重读”前人的历史。所以，思想史、哲学史在不断地“重写”或改写。大师们都在“重读”，我这个无名小辈更应如此了。重读马克思绝不是“无病呻吟”或“无是生非”，而是当代实践和科学以及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某个观点、理论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充分显示出它的本真精神和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20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困境，使马克思哲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理论的内在价值凸现出来，如世界历史理论、东方社会理论、交往理论、实践反思理论，等等，同时又使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和当代意义透显出来了。于是，重读、重估马克思的哲学便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我个人而言，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以及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促使我重读马克思的，并由此得出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即马克思的哲学仍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王：那么，你是如何重读马克思的？

杨：在“重读”过程中，我经历了从马克思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再到现代西方哲学、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哲学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求索过程，其意在于：把马克思的哲学置放到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理论空间中去研究。我以为，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把握马克思的心路历程，把握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在

何处以及何种程度上被误读了；只有把马克思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史的流程中去研究，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对旧哲学变革的实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划时代的贡献；只有把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当代社会发展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才可知晓马克思哲学的局限性，同时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伟大所在，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在这样一个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的面前便矗立起一座巨大的英雄雕像群，我深深体验到思想家们追求真理和信念的悲壮之美。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进行了社会主义思想史和理论经济学的“补课”。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学院派”，它的基本原理是在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生成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又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二者密切相关甚至融为一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而且是在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过程中生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是一种关于资本的理论，而且是对资本的理论批判或批判理论，它所揭示的被物的自然属性掩盖着的人的社会属性以及被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生物延续是同种相生，而哲学思维可以也应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哲学研究也应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哲学研究是一个艰难曲折的思想登山之路，“光荣的路是狭窄的”，但哲学研究的视野绝对不能狭窄。

王：您刚才说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如何理解这一观点？

杨：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1894年，意大利社会党人卡内帕请恩格斯为《新纪元》周刊找一段话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对此，恩格斯从《共产党宣言》中找出这样一段话，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并认为除了这一段话外，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了。实现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关注的焦点和追求的目标。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到《资本论》重申“自由个性”，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所以我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三、感悟人生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王：您的哲学研究颇有特色。在哲学研究中，您所追求的理论境界是什

么？

杨：我所追求的理论目标，是求新与求真的统一；我所追求的理论形式，是诗一般的语言，铁一般的逻辑；我所追求的理论境界，是建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我的确企望，我的哲学研究是“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真诚希望，我的哲学研究能为中华民族的再次腾飞做出贡献。但我也深知，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努力而勤奋工作是我唯一的选择。

王：在您的学术研究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是谁？

杨：我的两位导师汪永祥教授、陈先达教授以及挚友陈志良教授。汪永祥教授把我领进了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他扎实的理论基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研究引导我很快进入哲学研究的“快车道”；陈先达教授深刻的理论观点，铁一般的逻辑、诗一般的语言深深地影响了我，从此，我在哲学研究中一发而不可收；而陈志良教授大跨度的思维方式、渊博的知识给了我极大的启示。我忘不了我的两位导师和这位挚友，我深深地感谢他们，感谢多年来所有关心、爱护、培养和帮助我的师长、朋友和亲人。

王：问一些轻松的题外话吧。您一开始就谈到哲学与人生观的问题。我想问的是，您如何看待人生？

杨：您的这个问题并不轻松，相反，还有些沉重。人的一生可以有不同的追求，但有一点可能是共同的，即人的一生可以“过五关斩六将”，也可能“走麦城”。还是借用莎士比亚的话，那就是“光荣的路是狭窄的。”在我看来，“过关斩将”固然可喜，但“走麦城”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能正确地对待它。这里的关键是，要做到“荣辱不惊、波澜不惊”。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一定的修养，而要达到这种修养，需要学哲学和一定经历。只有哲学才能真正“看透”人生，而经历本身就是一笔财富。当然，这里有一个矛盾，即当你有一定的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经验时，你可能已经步入中年甚至老年了，属于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当你年轻而拥有充分的时间时，你往往没有经历，缺乏经验。所以，越年轻越容易犯错误。经常听到这样一句“宽宏大量”的话：“允许犯错误”。实际上，不管你允许不允许，是人总是要犯错误。如果人的生命有两次，我看人人都会不会犯错误，个个都是“先知先觉”。

王：假如生活对您不公时，您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杨：相信时间，学会忍耐，而且我已经学会了忍耐。做人必须学会忍耐，有时甚至要忍受你不能忍受的东西，但忍耐是一个人获得精神平衡的基础。

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议论、评价别人，同时自己又被别人

议论、评价。您是否看重别人对您的议论、评价？

杨：以前很看重，现在我不太在乎别人对我的议论、评价了。如果别人说的确是我的缺点，我努力改正就是了；如果别人说的不是我的缺点甚至是“恶毒攻击”时，我也不在乎，因为这不是我的过错。我非常喜欢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引用的但丁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套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我就是我”。所以，当我被别人误解时，一般我也不去解释，因为对明白人，你不解释他也明白；而对不明白人，你越解释他越不明白。在我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尘埃会落定，而“公道自在人心”。

王：您的话颇有哲理。看来哲学思维方式在您身上产生了作用。

杨：哲学已融入我的生命活动之中。哲学适合我，我也适合哲学，离开哲学我不知如何生存。

王：教学和科研之余，您的爱好是什么？

杨：欣赏交响乐。从中你会有一种形而上的领悟，并同样体验到真、善、美。

王：您目前最想做的是什么事？

杨：休息。找个“世外桃源”休息半年。

王：听说您是站着思考，坐着写作，是否有此事？

杨：确有此事。写作只能坐着，但思考必须站着。只有站着，独立不倚地站着，才能有真正的思考和创造性思维。

王：您的哲学研究的确有“个性”。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愿您永远站着思考，不断拓展自己的理论空间。

杨：不是接受您的采访，而是相互切磋。谢谢。

〔责任编辑：徐 子〕